

画乡消逝，年画何处落脚？

马知遥

“今天下午两点，随冯先生（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看望天津木版年画艺人王学勤，看他搬家，人去房空。该村最后一个艺人在城市化进程中退出了生养自己的村庄。”这是笔者于3月27日写下的日志。

今年春节前夕，笔者还随冯骥才先生去看望过王学勤，那天冯先生让秘书提了两瓶五粮液、一包茶。王学勤的家在距天津市市区约30公里的张家窝镇官庄子村，笑逐颜开的“缸鱼”大爷早就站在门前，迎接我们。他的家陈设简陋，平时画缸鱼的地方就是卧室旁一间简单而拥挤的小屋。当地年画艺人告诉我们，今年王学勤印了8000张“灶王爷”，主要是周围村里的人来买，住楼房的村民和城里人已没有用它的了。在交谈中王学勤说，今年“五一”前这里的房子就要拆迁了。冯先生有些忧虑，立即嘱咐我们要抓紧时间将王学勤作画的画室拍下来，并打算按原貌搬到天津大学的年画博物馆里去。大家都担心，在新农村建设不断加快的今天，那些被保留和挽救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在何处落脚呢？虽然手艺人还



拆迁中的画乡

在，但失去了使用手艺的村落，失去了对手艺感兴趣的人，手艺又该如何存活呢？比如年画，如果村落没有了，年画中的“缸鱼”和“灶王爷”又将贴在哪儿？村民们会不会很快将它们丢弃并遗忘？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分“细活”和“粗活”，“细活”的风格是精描细绘，色彩素雅，“粗活”则豪放粗犷。王学勤画的是“粗活”，他凭着世代传承的绘画技艺成为中国唯一以“粗活”形式绘制杨柳青年画的民间艺人，因此被视为津味文化的“活化石”。“缸鱼”是天津杨柳青传统年画的独特品种，王学勤画的缸鱼线条粗犷、色彩



缸鱼艺人王学勤

艳丽，蓝绿色的底子衬着一条肥头大尾的缸鱼，四周点缀些绿叶粉莲，下方印有“连(莲)年有余(鱼)”4个大字。

官庄子村现有人家750余户、2700人。村里以宫、王、展姓为主，其中宫姓为最大姓。据宫家家谱记载：官家最早来自山西太原，在这里已繁衍生息了280余年，占村中人口的70%。王家家谱是王学勤的本家弟弟王学桐整理的，据记载：最早王家是从山西洪洞县移民到天津静海的，王家人娶了官家的女人，才迁移到了这里。过去这里的人主要靠种植小麦、玉米为生，但收入十分微薄。近年来，

随着周围的镇办企业多了，村里人都到企业上班去了，打工成了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据悉，在“文革”以前，官庄子村家家都会画年画，这里的画还曾出口到世界各地。“文革”时破四旧，许多年画版都被烧了，没了版就没法印年画了。由于王学勤一家还留有几块版，所以他还能坚持下来。

据原官庄子村支书宫玉祥回忆，他小时候一放学就会帮家里画年画，但主要是上大色，上轮廓的多数是长辈们。那时村里家家都去卖年画，天津古文化街上到处都是官庄子村人摆的年画地摊。宫玉祥说，大家画

的年画虽然属于“粗活”，其实活儿很细，当时有的村民还创作《清明上河图》，可惜现在没人再画了，因为不挣钱，而且也没多少人买——没处贴了。“现在供‘灶王爷’的也少了，都上楼了没有灶了。”现任村支书王连省有些感慨地说。

说起村庄的搬迁，王连省说：“镇上要在这里改成高科技农业示范区，种植灵芝、蘑菇等各种经济作物。村民搬走后主要由镇政府组织开发，村民两年后回迁集中居住。”当地的规划是：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工农业一起上，并倡导三集中，即居住集中、农业集中、工业集中。节余的土地主要用于建设工业和农业示范园区，工厂产生的效益会回报村民，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费用。这一政策似乎兼顾了村民未来的利益，居住环境也得到了改善，但村里的老年人几乎没有愿意搬的，因为这是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随着最后一个缸鱼艺人搬走了自己的土地，原来的河港沟岔也将不复存在，木版年画赖以生存的环境早已面目全非，让大家不得不担心在新农村建设中这里的木版年画还能否继续存在？

广东五华：石雕手艺人鲜见年轻面孔

唐林珍 万自明 廖伟军

广东五华作为“石匠之乡”，数百年来名师巧匠辈出，石雕工艺闻名海内外。五华的石雕已有460多年历史，其工艺现已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如今五华石匠这一群体人数在逐渐减少，且鲜见年轻面孔。

日前，笔者专程到广东省五华县河山镇黄坑村，拜访了几位年逾古稀的石匠：77岁的赖汉城和赖汉贵、78岁的赖乃林、81岁的赖乃祥。提起石雕工艺传承的话题，老石匠们感慨甚多，他们很担心，当老一辈石匠都退休了，几百年来积累下的五华石雕技艺只有在历史书籍中才能看到了。

五华石雕艺人技艺精湛，他们能凿石成门、窗、柱，更能在石上雕刻人物、飞禽走兽、花鸟山水等。赖汉城、赖汉贵、赖乃林和赖乃祥在年轻时都是雕刻技艺过人的石匠，曾在上世纪50年代参与过北京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的建设，随后还参与了广州解放纪念馆、越秀山五羊石雕、江西“八一”南昌起义纪念碑等石雕作品的创作。

甘肃康县传统土纸制造 “七十二道手，上墙还要吹一口”

张志华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造纸术已被现代工业造纸所取代，但在甘肃省康县大堡河一带，至今还延续着传统的手工造纸术，康县大堡镇庄子村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村落之一。

李生武是庄子村村支书，同时也是村里主要的造纸术传承人之一。1982年，22岁的李生武便继承了父辈的造纸技术，一做就是30年。他说，这里制造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土纸，造纸作坊以家庭为单位，男女老少都参加，造纸技术也是口口相传。

据介绍，这里的造纸工序十分复杂，有“造纸七十二道手，上墙还要吹一口”的说法。距村子半公里的纸坊沟，是村民们集中造纸的地方。略显狭窄的山沟杂地排列着几十间纸坊，有的纸坊保护较为完整，依然在使用，有的已经破旧不堪或坍塌废弃。村民李文美正在自家纸坊内捞纸。李文美用的“捞纸”工具是一件用极细的竹丝编成的帘子，只见他用捞纸帘在纸浆池中轻轻一捞，便将纸浆“捞”起来了。“每次捞三张纸浆膜，再经过后续工序，纸浆膜干了以后就是一张纸了。”李文美说。

李生武解释说：“纸张的厚薄平整完全取决于‘捞纸’师傅的功夫，轻荡则薄，重荡则厚。纸坯经过压机压榨掉水分，再

让其风干，然后又进入另一道关键工序——松纸，即把本来粘连在一起的纸坯分页。”

据康县文化部门考证，1919年至1923年，该县共有纸农6000余户，年造纸2.5万担。1958年前后，由于全社会破除封建迷信，主要用作祭奠的土纸被迫停产，直至1979年，私营造纸业再次在当地兴起。在李生武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是这里造纸较为辉煌的时代，全村40多家家在造纸，没有人出去打工。那个时候每户村民平均一天能做2000张纸，每天有超过10元的收入。李生武说，因为造纸，当时村民的生活条件明显优于别的村落，家家都买了收音机、自行车和缝纫机。

近年来，由于土法造纸技术难度大、工艺周期长，加之捞纸、烘纸又非常辛苦，年轻人多不愿意学，所以掌握这项技术的人越来越少。另外，加上工业造纸的冲击，目前该村常年专门造纸人家已不足10户，而仍在坚持生产的部分作坊也已步履艰难，经济收入逐年下降，传统造纸技术面临濒危状况。

“祖祖辈辈干了几百年的产业，我们不想放弃。”李生武目前正在试图改变思路，想将土纸改为质量较高的书画纸，不再简单用来祭祀、焚烧。



近日，2011浙江新春茶祭大典在天姥山国家级风景区举行。茶祭大典包括鸣炮、献贡品等12项传统仪式，我国古代有不少高僧、隐士等曾在天姥山品茶悟道。千百年来，天姥山地区形成了谷雨前举行茶祭的习俗。图为茶艺师在茶祭大典上表演茶艺。(新华社发)

《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将面世

本报讯 为保护广西南宁的文化生态，一部充分展示南宁非遗保护面貌的书籍——《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典(2006—2010)》(以下简称《图典》)将于近日面世。

南宁市的非遗资源丰富多样，此次编撰出版的《图典》展示的是2006年至2010年南宁非遗保护工作的阶段性成果。该书以20余万字、600余幅图片，全面、客观地介绍了53个代表性的非遗项目，内容包括这些项目的地理分布、历史渊源、基本内

容、表现形态、文化价值以及濒危状况等。

据介绍，目前南宁市已经建立起有效的非遗保护机制，有44个项目列入自治区级非遗名录，4个项目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并建立了一批非遗传承基地。(杨宁筠)

专家视点

陕西韩城位于关中原东北角，这里历史文化悠久，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韩城秧歌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并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虽然当地政府对于韩城秧歌的挖掘、抢救工作十分重视，但由于许多客观原因，对它的全面保护工作仍然迫在眉睫。

韩城秧歌融歌、舞、戏、曲于一炉，是向戏曲衍化、且初具戏曲雏形的艺术形式。关于韩城秧歌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源于后唐宫廷，如秧歌《彩楼配》中之表段子：“正月十五君民乐，唐朝之表唱秧歌，天子要丑耍得好，正官娘娘把头包。”此说乃民间传闻，史无可考。再一说源于宋元杂剧。从音乐发展、表演程序的角度考察，韩城秧歌明显受到宋元杂剧的影响，它的唱腔音乐属曲牌联套，颇似“诸宫调”的套曲。从“丑”“包头”的称谓上讲，也像从宋元杂剧的沿袭而来，不难看出从音乐到表演，在韩城秧歌中都能找到宋元杂剧的影子。

应该说，韩城秧歌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有过它的辉煌，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秦腔、蒲剧的兴起，使得韩城秧歌在竞争中一步步走下坡路。五六十年代，它退出城镇，只在乡村山野才

有其生存空间。八九十年代，已几乎见不到它的踪影。韩城秧歌再不挽救，将自然消亡。

说到韩城秧歌，其保护价值有三。第一，韩城秧歌融多种艺术形式于一炉，且系最易掌握、普及和便于群众性口头创作的艺术表演形式，故保存了大量历史遗存的反映当地群众生活的说、表、唱、舞、戏等形式的各类文艺作品，对研究韩城地域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及方言俚语、人文风俗等，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and 引证价值。

第二，韩城秧歌不仅其曲牌是关中秧歌中数量最多的，而且也是关中秧歌中最富有个性特色的。韩城秧歌的说唱比重较大，其“说”有方言化了的音乐性，其“唱”有音乐化了的方言性，这在关中秧歌音乐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由于这两个原因，故在探索其音乐特色，以及关中方言与关中秧歌音乐的密切关系方面有着重要的审美价值、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

第三，韩城秧歌是由歌舞形式向戏曲形式过渡、衍化的历史遗

消失的“秧歌窝子”

雷达

迹，明显有着元曲演出形式的遗存。由于经济的发展、艺术的进步，这种艺术发展的历史遗迹在我国众多民间艺术中存活的不多，故显得尤为珍贵。就这点来说，它对丑、旦人物的最初形成、道白唱腔的运用发展等属于戏曲史学范畴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

基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应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对其予以有效保护。其一，在过去收集整理剧目、曲目、音乐、舞蹈的基础上，还应组织力量继续深入农村(尤其是边远山区)进一步采访尚健在的老艺人，进一步补充原生态的艺术资料。要着重挖掘活资料，解决一些悬而未解的难题，如丑角戴的“赞赞帽”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如何制作和戏耍等。

其二，在农村收集有关韩城秧歌过去演出所用的乐器(鼓板、马锣、大锣三大件)、服装、道具(清代的桌椅、板凳、农具、风箱，男性用的烟袋、毡帽、土布腰带，以及女性用的帕巾、袄裙及其他饰物)，连同过去收集的秧歌手抄本、艺人照片等资料，一并编辑入

风俗

四月八姑娘节：苗族青年的情人节

陶飞越

湖南省绥宁县位于湘西南边陲，这里历史悠久，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吸引了许多学者和游客慕名前往。四月八姑娘节是苗族以吃黑饭、祭女祖为主要内容的一个盛大节日，是苗族文化在当代得以延续的重要载体，并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姑娘节的由来与北宋时的杨家将有关，据说杨文广在战斗中曾被敌军俘虏，关在牢房里吃不上饭。妹妹杨金花心生一计，到山上去采摘黑叶榨汁，拌在糯米饭里，农历四月初八这天给哥哥送过去。狱卒看到糯米饭不敢吃，杨文广吃了黑饭后立即变得力大无穷，砸破牢笼，冲出困境，但杨金花却在救援中牺牲。从此，绥宁苗族就把农历四月初八这天定为纪念杨金花的姑娘节。

传说流传至今，逐渐演变成

了苗族代代相传的传统节日。在四月初八这天，苗族通常会把出嫁的姑娘接回家，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全家人也会聚在一起吃黑米饭。除了吃黑米饭外，苗族群众还用喝米酒、唱大歌等形式来庆祝节日的到来。这天也会变成苗族青年男女的情人节，他们会在林间僻静之处唱山歌、吹木叶、听苗笛，互诉情衷，表达着苗族儿女炽热的爱慕之情。

苗族四月八姑娘节是苗族民俗的精华，对它的保护和传承必将弘扬和展示苗族文化的独特神韵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因此，当地政府于1996年举办了首届四月八姑娘节，此后每年四月初八定期举办。节日期间，许多中外游客和苗族年轻人一起吃黑米饭、赛山歌、打秋千，参加“背媳妇”等活动，体验苗族同胞沿袭了上千年的传统习俗。

各地

仙居无骨花灯学徒仅剩4人

本报讯 起源于唐代的浙江仙居针刺无骨花灯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许多非遗项目一样，目前针刺无骨花灯也面临着学徒少、产品市场化程度差、缺乏资金保障等传承困境。

与其他传统花灯不同，针刺无骨花灯没有骨架，全用绣花针刺成各种花纹的纸片粘帖而成，有钻绣、绣球、荔枝等多种造型，点燃后灯体看上去似昂非昂、似纱非纱，非常精美。

该项目的国家级传承人、仙居针刺无骨花灯研究所所长李湘满说：“无骨花灯起源于唐朝，所以当地老百姓叫它‘唐灯’。针刺无骨花灯完全依赖艺人的

纯手工制作，一盏20厘米见方的灯需要一个手艺人加班加点10多天才能完成。”无骨花灯目前还没有固定的市场销售渠道，仅在举办展览时卖过一小部分，每盏灯价格在2000元左右。由于市场化程度差，每个手艺人月收入仅有几百元，让这门好不容易被抢救回来的传统工艺再度面临失传的困境。

收入不高，就招不到学徒。据悉，李湘满自1986年开始招徒弟，100多个徒弟现在只剩下了4人。如今已经68岁的李湘满生活极其简朴，他把自己多年的积蓄10多万元都投到了无骨花灯上。他说，希望能再抢救一些品种，多为后人制作、保存些样品。(商意盈)

湖南举办茶山号子赛歌会

本报讯 近日，湖南省辰溪县举办了“首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茶山号子赛歌会”，34位民间艺人一展歌喉，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饱尝了一顿原生态的音乐大餐。

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茶山号子流传于辰溪县黄溪口地区的瑶乡。瑶族群众除了耕作稻田以外，还经营大片油茶林，茶山号子就是他们冬季翻挖茶山时唱的劳动号子，其过程是鼓手先祭土地神，挖山的人们在山脚下一字排开，然后鼓手在前方不远处敲鼓，伴随鼓声，号子声的节奏扬越高亢，很有鼓动人心的作用。茶山号子的发声方法也十分独

到，音乐旋律奇特，高音区翻高八度且特别高尖，堪称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奇葩。

为了传承发展好这一艺术瑰宝，近年来，辰溪县专门为一对一的传承人机制，即民间艺人每年带一名徒弟，视其徒弟的歌唱技艺、县政府和文化部门每年会给予2000元至5000元的补贴。另外，当地政府还决定从2011年起，每年举办一次赛歌会，对取得前3名的新人，县政府对其师傅再给予重奖。今年，当地有关文化部门还在瑶族乡的一些学校开办了茶山号子培训班，招收了30名学生，由茶山号子传承人集中授课。(辰昔)

个十分可喜的现象。如在当地的井滩、许庄等村镇，群众的积极性很高，连续不断地举行秧歌演出。如果能保护群众的这种积极性，重点扶持农村各类有关活动，使秧歌真正在农村扎根，并结合经济、旅游等开发项目，举办有较高档次的秧歌创作、秧歌大赛等活动，振兴韩城秧歌是很有希望的。

韩城秧歌是反映韩城人民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是韩城人民还将继续谱写的“音诗画卷”，这张熠熠闪光的韩城名片需要我们重新把它擦亮。

(雷达，曾任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等职，现为陕西省民间文艺促进会副会长)



韩城秧歌艺人